



第二輯

中學西漸叢書

乐黛云 主编
申荷永 高岚 著

荣格与中国

文化

JUNG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第二輯

中學西漸叢書

乐黛云 主编
申荷永 高岚 著

荣格与中国

文化

JUNG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与中国文化/申荷永,高岚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0

(中学西渐丛书/乐黛云主编)

ISBN 978-7-5656-4217-3

I. ①荣… II. ①申… ②高… III. ①荣格(Jung, Carl Gustav 1875—1961)—哲学思想—研究 ②荣格(Jung, Carl Gustav 1875—1961)—哲学思想—影响—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B84—065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8062 号

中学西渐丛书

RONGGE YU ZHONGGUO WENHUA

荣格与中国文化

申荷永 高 岚 著

责任编辑 杨林玉

封面设计 王征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http://cnupn.cn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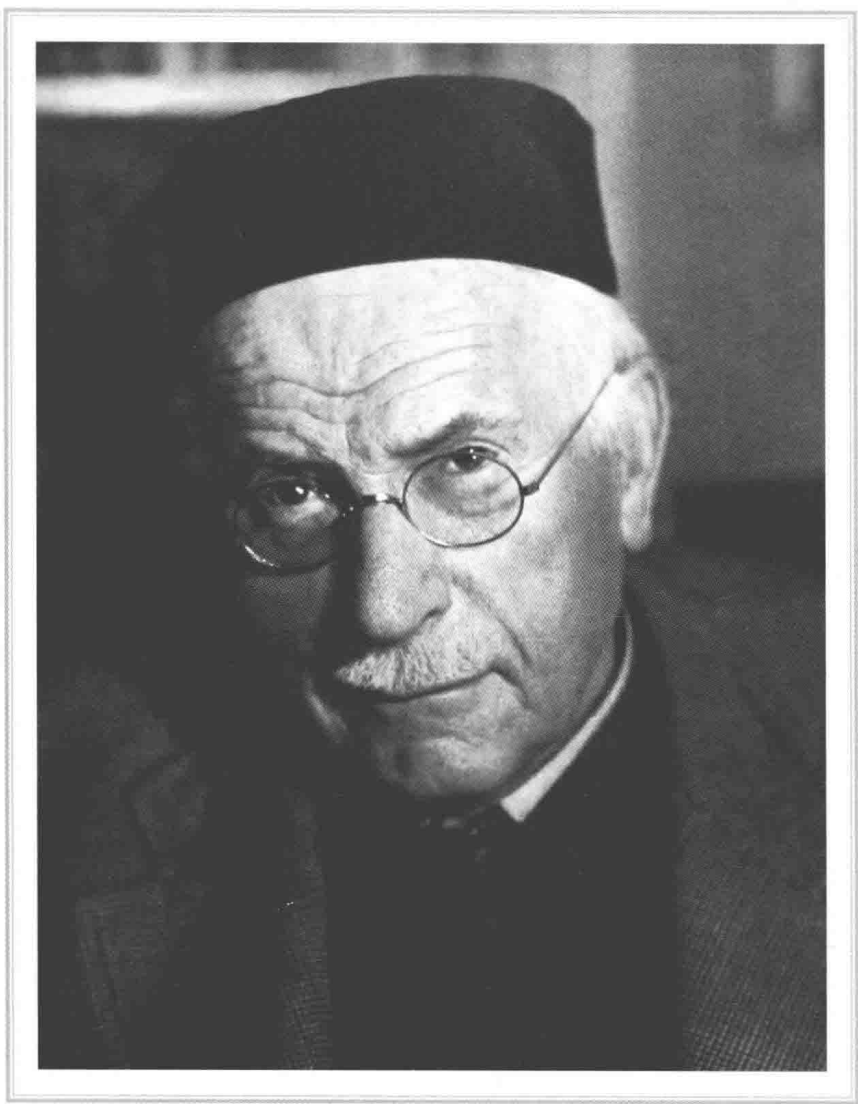
字 数 358 千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荣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总 序

乐 望 云

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战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



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②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① 参见《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乐黛云：《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0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美]J. 里夫金：《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杨治宜译，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2006。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①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③

① 参见乐黛云：《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56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参见[法]于连：《迂回与进入》前言，杜小真译，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法]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①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②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③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

① 载《文汇报》2004年7月27日。

② [法]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文化还是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载2001年4月“多元之美”大会文献。

③ [意]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1)，5页。



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



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中学西渐丛书第二辑将陆续出版，包括以下5种：《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黑塞与中国文化》《伏尔泰与中国文化》《荣格与中国文化》《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9年7月1日

序

荣格从未去过中国，但中国一直在其身边，以神话与象征的形式，伴随其朋友卫礼贤所翻译的中国经典。荣格对于《易经》《金花的秘密》和《道德经》等都悉心倾情。他无比钦佩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及其智慧，并努力从中国文化中学习与其欧洲教育和背景截然不同的新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荣格尽力克服欧洲中心思想，将中国观点和思想形式融入西方意识，将中国思维方式的重要元素纳入其深度心理学理论。荣格深信，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科学，特别是对于欧洲的心理治疗具有并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申荷永教授和高岚教授的著作充分呈现与阐述了中国文化对荣格生活和工作的碰撞与影响。申教授有着长期的分析心理学研习，并且成为中国首位接受全面培训和认证的荣格学派心理分析师。他对中国心理学根源的研究，其“核心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Heart)，有助于构建中国文化与分析心理学之间重要而坚固的桥梁。构建东西方文化之间沟通与理解桥梁的努力仍然在其早期阶段，至少就西方而言，我相信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成就。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在学习，就荣格研究和评论的中文经典中所包含的古老智慧，我们仅仅是触及其中的凤毛麟角。申荷永教授和高岚教授帮助我们获得中国心灵发展的更完整意象，这将有助于增进对我们之间相同与差异的理解。

荣格最重要的洞见之一是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互为补充的关系。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文化与其无意识相似，就其与自我意识的关系而言。若其处于模糊和未知，西方就能够对其投射自身的阴影和自卑。当中国文化为西方所熟知，当两个领域之间构建起桥梁时，这两种文化则可以互



补，克服其各自的片面，共同接近人类的整体性。双方都可为充分发挥人类心灵所包含的潜力做出本质性的贡献。

荣格能够把握这种互补关系，并将其用于联结因果关系与共时性（“有意义的巧合”），发展自性含融对立的理论（雌雄，阴阳）。此外，荣格的自性化理论，一种终身的心理和精神发展，与中国禅宗《十牛图》等文献和有关佛教著作有类似表述，他将其添加于对人类所有发展潜力的理解之中。对于今天的荣格学派思想家来说，显然东方和西方需要彼此来充分表达人类发展计划，双方都不应致力于控制对方。尊重分歧至关重要，惟此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获得共识的涌现。

近二十年来，申荷永教授和高岚教授在其许多著作、讲座、教学，以及他所组织的有关主题的诸多学术会议中，促进了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他们所呈现的《荣格与中国文化》正是这一重要对话的进一步发展。于此他们向中国读者介绍荣格的生活与工作，探索与阐释荣格如何将中国文化融入其心理著作；于是，他们为西方荣格思想家和中国学者的深入对话奠定了基础。我相信，读者通过本书也将了解到分析心理学有助于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九十多年前，在其朋友卫礼贤的陪伴下，荣格沉浸于这种和东方的对话。在接下来的许多年，由于世界局势动荡，这一事业耽搁许久。如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对话窗口再次开启，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申教授于此率先垂范，努力引领。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西方荣格学者从深度心理学视野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史。对于共享原型模式，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索。

我很荣幸能为申荷永教授和高岚教授的《荣格与中国文化》一书贡献这简要的序言。我期待有更多有关的研究，更多能够推进东方和西方对话的著作，能够将世界整合为具有共享价值和共享利益的地球社区。

默瑞·斯丹(Murray Stein)

国际分析心理学学会前任主席

于瑞士苏黎世

2017年3月

Foreword

Jung never traveled to China, but China traveled to him. It came to him in the form of myths and symbols and in th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by his friend, Richard Wilhelm. Jung was fascinated by such works as the *I Ching*,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 *Tao Te Ching*. He had an enormous appreciation for the cultural depth of Chinese traditions and their wisdom, and he tried to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new and different ways of seeing and thinking that are profoundly other from those of his European education and background. He did his best to overcome Euro-centrism and to bring Chinese perspectives and forms of thinking into Western consciousness and to incorporate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ese modes of thought into his depth psychological theory. He was convinced that Chinese culture ha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ke to Western science and specifically to European approaches to psychotherapy.

Prof. Shen and Prof. Gao Lan have written a work that gives a full account of the influence and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on Jung's life and work. Shen and Prof. Gao Lan are a longtime student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he became the first fully trained and accredited Jungian psychoanalyst in China. His research into the roots of Chinese psychology ("the psychology of the heart") has helped to build an important and sturdy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e effort of building a bridge of significant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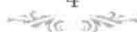


cultures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as far as the West is concerned, and I am sure much more will be contributed in years to come. We in the West are still learning and have barely scratched the surface of the ancient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Chinese texts that Jung studied and commented on. Prof. Shen and prof. Gao Lan are helping us to get a better picture of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psyche that might be useful in increas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One of Jung's most important insights was that European and Chinese culture stand in a complimentary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est, Chinese culture is similar to the unconscious in its relation to ego-consciousness. When it remains obscure and unknown, the West is able to project its own shadow inferiority into it. When it becomes more known and a bridge is built between the two realms, they can assist each other in overcoming the one-sidedness of each and bringing both closer to approximating human wholeness. Each adds essenti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ll potentials contained in the human psyche.

Jung was able to grasp this complimentary relationship and to use it in relating causality to synchronicity ("meaningful coincidence") and in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opposites inherent within the self (masculine-feminine, yang-yin). Moreover, Jung's theory of individuation, conceived as a life-long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has its Eastern expression in such texts as Chinese Chan's "Ten Ox-Herding Pictures," and from Buddhist works such as this Jung added features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ll potential for human development. It is apparent to Jungian thinkers today that the West and the East need each other for the project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its full expression, and that neither side should seek to dominate the other. Respect for differences is essential, and only then can true dialogue take place and common ground emerge.

Prof. Shen and Prof. Gao Lan have promoted the dialogue between Jungian psychology and Chinese culture in his many writings, his lectures and teaching, and in the numerous conferences on this topic that he has





sponsor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book he presents here on C. G. Jung and Chinese Culture i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important dialogue. Here they are introducing Chinese readers to the life and work of Jung and discussing how Jung integrated Chinese culture into his psychological works. They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further dialogue in depth between Jungian thinkers from the West and the scholars of China. I am sure their book will also show readers in China that analytical psychology can also be useful for recovering their ancient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giving it a new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ccompanied by his friend, Richard Wilhelm, Jung engaged in this dialogue with the East some ninety years ago.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re was a long pause in this project due to world events. Today the window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re open once again, and the time is ripe for further advances. Prof. Shen's leadership in this effort is exemplary. It is to be hoped, too, that more Jungian scholars from the West will seriously take up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a depth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work still remains to go more deeply into shared archetypal patterns.

It is an honor to contribute this brief Foreword to Prof. Shen and Prof. Gao Lan's book on C. G. Jung and Chinese culture. I look forward to more studies of this kind, works that will advance the dialogue and serve to unite the world into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values and interests.

Murray Stein, Ph. D. , Past President of the IAAP
Zurich, Switzerland.
March 2017

引言

荣格与中国文化：缘分与使命

2011年6月6日，在瑞士苏黎世艺术博物馆举行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21世纪中的荣格”，作为对荣格去世五十周年的纪念。

来自世界各地的荣格学者与荣格心理分析师数百人参加了这一国际盛会，其间“荣格与中国文化”也是备受关注的內容，我们作为来自中国的代表受邀参加。此时，荣格家族与荣格著作基金会已签署《荣格全集》中文版出版合约^①，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②也在筹备之中。荣格的孙子，荣格著作基金会主席安德烈·荣格(Andreas Jung)特意表达其对于荣格分析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敬意，出席活动的主要学者和特邀报告者：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卡斯特·维蕾娜(Kast Vance)、艾伦·古根布(Allen Guggenbuel)^③等，也都与“荣格与中国文化”的主题有着重要关系。

1994年8月，时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主席的托马斯·科茨，在其代表IAAP首次访问中国的学术演讲中特别提出，对荣格心理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或者是尤金·

① 《荣格全集》(20卷)中文版由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于2018年陆续出版，申荷永为主编(申荷永与高岚还策划与主编了九卷本《荣格文集》)。

② 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于2012年6月6日在澳门城市大学和澳门大学召开(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于1998年9月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和肇庆七星岩召开)。

③ 北京大学首届“中国荣格学术周”(2006)的主要讲师。



布洛伊尔(Paul Eugen Bleuler)^①或让内(Pierre Janet)^②，而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③与中国文化。

仍然是托马斯·科茨，2010年10月在复旦大学的访问讲学中，当被问及荣格与弗洛伊德之最大不同是什么的时候，托马斯·科茨十分自信地回答说：“荣格与弗洛伊德，以及分析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之最大的不同，在于荣格以及我们荣格学者，都熟悉《易经》和中国文化，而弗洛伊德与其精神分析师则不然。”^④

托马斯·科茨曾与荣格本人做过心理分析，其父母詹姆斯·科茨(James Kirsch)和茜尔达·科茨(Hilde Kirsch)也都是荣格早期的学生，他自己也是资深荣格心理分析师、荣格分析心理学历史学家。在其代表著作《荣格分析师：比较与历史的视野》一书中，托马斯·科茨说，“分析心理学与中国的联系是重要的……荣格深受古老中国智慧的启发。分析心理学与道家哲学之间也存在着历久弥新的深切联系！”^⑤

荣格的孙子安德烈·荣格曾在写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我太太和我两年前曾经访问中国，我们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人们的友善以及中国令人赞叹的名胜古迹和现代化城市的惊人发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今巨变和革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稳定而坚实的基础，一个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中获得的坚实基础。所以，我们非常赞同你在复旦大学的工作和举办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感谢你为寻找分析心理学的本质所付出的心血和巨大努力。”^⑥

荣格是杰出的心理学家，他与弗洛伊德一起，共享无意识心理学之开创与发展的殊荣。弗洛伊德以“个体潜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和“情结”(complex)为基础建构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荣格则以“集体无

① 尤金·布洛伊尔(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瑞士著名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裂症”一词的创用者，荣格的良师益友。

② 让内(Pierre Janet)，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曾随其学习。

③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中国生活20余年，翻译包括《易经》在内的诸多中国经典，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建立中国学院，被称为发现中国内在世界的马可·波罗。

④ 作者在现场的记录。

⑤ 托马斯·科茨，《荣格分析师：比较与历史的视野》，古丽丹、何琴翻译，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⑥ 安德烈·荣格写给作者的信，2009年5月。